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维护策略

任保平¹, 邹起浩²

(1.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63; 2.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经济发展韧性是长期发展视角下经济体适应变革、持续演进和稳定发展的素质和潜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经济发展韧性内涵的理论阐释, 从基础韧性、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和制度韧性 5 个方面确立经济发展韧性评价维度, 测算 2000—2021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及各分项维度指数, 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演化趋势, 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间和各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韧性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和演化趋势, 提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

关键词: 经济发展韧性; 新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能力; 经济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4)03-0015-11

Resilien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val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aintenance strategies

REN Baoping¹, ZOU Qihao²

(1. Schoo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Suzhou 21516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ilience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quality and potential of an economy to adapt to change, continue to evolve, and maintain stable development from a long-term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five aspects: basic resilience, scale resilience, structural resilience, innovation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t calculates the index of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 sub-dimensional indexes from 2000 to 2021,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has shown a steady upward trend in time dimens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resilienc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within each region have shown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first expanding and then shrinking in space dimension. Combined wit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of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maintenance strategies for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ilienc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ce

收稿日期: 2023-04-19 修回日期: 2023-12-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3JLB011)。

作者简介: 任保平(1968—), 男, 陕西凤县人, 经济学博士,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等。通信作者: 邹起浩。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面对历次国际经济危机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所引致的风险和不利影响,中国经济从未陷入停滞,也极少出现大范围的经济乱象和社会动荡,始终能够保有较大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来钝化冲击带来的被动型震荡并迅速回归发展常态,表现出较强的适应变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种适应变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就是经济发展韧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而中国又恰逢经济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外部发展环境纷繁复杂,内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风险交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有效适应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局势并维护好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既是稳定经济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也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深化对经济发展韧性的理论研究并探索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对于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评述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韧性的理解和界定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研究对经济韧性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韧性反映了经济体对不确定性扰动的应对能力以及经济系统对各类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2-3]。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韧性是指经济体在遭受外来冲击之后回归发展常态的恢复能力^[4]。上述两种观点侧重于考察短期内经济体在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的反馈效率、调整能力和恢复速度。第三种观点基于动态演化的视角,认为经济韧性不仅体现了经济体对短期危机的应对能力,还应包含经济体响应环境变化、重新调配整合资源、摆脱路径依赖、实现全新增长态势的素质和潜力^[5-6]。这种观点将经济韧性的内涵由短期引向长期、由均衡稳态延申

到动态演化,被众多学者肯定和采纳,是目前学术界解读经济韧性的主流观点。

现有的经济韧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领域,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其中,城市和区域经济学领域中的韧性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察和评判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或是由不同视角切入来测度城市、城市群和局部区域的经济韧性,并进一步分析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4,6-8];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韧性研究主要侧重于研判宏观经济对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探究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以及抵御各类不确定性冲击的对策^[2,9];发展经济学对经济韧性的研究则力图将经济韧性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并针对性地提出维护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思路和策略^[10-11]。同时,还有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和空间溢出作用、数字经济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的路径等方面展开探讨,着重强调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韧性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为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对于经济韧性的量化和评估,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以下3种方法:一是依据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2],其优势在于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而形成对经济韧性水平的总体把握。但由于指标体系法在指标选取和权重分配等方面始终存在争议,其测度结果的准确性容易遭受质疑;二是聚焦某一核心变量,将其引入计量模型中,观察计算冲击前后核心变量的变动情况并与无冲击扰动情况下的变量结果进行比较,进而分析韧性水平^[6-8],这种方法对于评估单次冲击对经济体的影响较为适用,但易于忽略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以及核心变量以外变量的边际贡献;三是借助脉冲响应函数、韧性演进曲线等工具对经济系统的韧性进行模拟^[2,9],其优势在于兼顾了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对韧性水平的变化趋势的反映较为直观。这种方法对于衡量经济系统对各类风险的抵御能力尤其适用,但对于研判经济发

展的长期趋势和考察经济体的长期发展能力则较为局限。

回顾经济韧性的已有研究文献,现有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已有文献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多侧重于探究经济体应对短期冲击时的能力和表现,需要更加关注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和潜力;二是国内研究对局部区域和城市经济韧性的评估和分析较多,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整体测度和评价较少,需要进一步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进行深入分析;三是量化和评估经济韧性的文献中结论性评述较多,而针对新发展阶段维护经济韧性提出的维护策略建议需要加强。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视角,借鉴演化韧性的思想,将经济发展韧性界定为长期经济发展视角下经济体适应变革、持续演进和稳定发展的素质和潜力。试图在研判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总体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索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从而为指导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作出边际贡献。

二、经济发展韧性的理论内涵及评价维度

为了具体化经济发展韧性的理论内涵,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韧性的决定因素,从基础韧性、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和制度韧性5个维度来综合考察经济发展韧性。

(一)基础韧性维度

基础韧性是经济体面临短期冲击或长期环境变化时的初始条件,由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口的整体素质和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能力构成。首先,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关乎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供给和自然空间。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成本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进而影响基础韧性的强弱。其次,人口的规模、结构和整体素质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形成。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越大,人力资本积累越充足,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间分布越合理,经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就越大,经济发展的基础韧性也就越强。最

后,经济发展的基础韧性还体现为经济体在没有政策调节的情况下,具有降低外部风险干扰和维系基本功能的能力。尽管外部扰动必然会增加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成本,但是经济系统自身的稳定能力能够有效降低不确定性,给经济政策的调整预留更大空间。

(二)规模韧性维度

规模韧性是经济发展成果的直观反映,与经济增长过程紧密联系。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市场成熟度是规模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现代、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常态化时期为生产、服务、贸易等经济活动提供便利,为工业发展带来运输和时间上的巨大成本优势,保障国民经济的供给能力;在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阶段,确保资源调配的速度、信息反馈的效率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在经济体恢复与更新的过程中,加强人与人的连通性和交互作用,促进知识的溢出和企业家精神的萌发,催生出更多创新和创业的契机。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中心、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对于强化个体之间、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的规模和发达程度决定了经济体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平衡能力和缓冲空间。市场主体越多、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越大,资源配置的深度和广度就越大,容纳和消化外部冲击的空间也越大。同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也能够为企业的成长和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增强经济体遭遇外部冲击后的恢复和更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结构韧性维度

结构韧性是指经济结构为钝化外部冲击和积聚发展动能所能提供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在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以及新产业的成长对于结构韧性的影响最为突出。首先,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整的产业链条是结构韧性的重要支撑。尽管庞杂、分散的产业体系不利于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但能够有效增强经济体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当某个产业

门类或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受到冲击时,产业体系越完整,其修补和替代的能力就越强,经济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小。其次,需求结构的合理程度是影响结构韧性的关键变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求结构会呈现出不同特征。早期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参与国际循环在推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潜在影响加大。随着工业生产体系逐渐完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升,经济体内部循环的能力会随之增强,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强度也将逐步减小。适时协调内外需关系并使之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相适应是结构韧性的重要体现。最后,新产业的成长能够为结构韧性提升注入源头活水。新产业的成长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结构性增长,带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特别是目前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产业结构由分立走向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推动企业内的生产协同、企业间的产能协同和产业间的产业协同,对于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创新增长和维护经济发展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 创新韧性维度

创新韧性是指经济体在应对环境变化和经济冲击时保持主动性的素质,以及在恢复阶段摆脱路径依赖、调整内部结构与功能、引领经济转型的能力。经济发展的创新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创新投入的连续性。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创新领域面临着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和困难,因而创新活动本身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尤其当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资源和市场的可获得性降低时,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了规避风险,极易减少甚至中断创新投入,最终导致创新规模缩小和创新失败。能够保持创新投入的连续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前提条件,也是经济体具有创新韧性的典型特征。二是创新成果的有效性。创新成果的优劣多寡和价值实现是经济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直接反映。只有当创新领域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且创新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向全社会扩散时,经济发展水平才具备向更高层次跃迁的基础。三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1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而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的创新韧性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萌发。企业家的危机意识、创新创业意识、风险辨别能力和创新敏感性对于保持创新投入的连续性和提高创新成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或经济冲击来临之际,企业家能否感知外部环境的细微变化、适时变更发展战略和引导企业的创新方向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持续进行有效创新的能力。

(五) 制度韧性维度

制度韧性是指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通过合理适度的调整始终与经济制度的需求相适应,进而保障经济利益的实现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制度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制度的能动性。制度的能动性反映为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制度创新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二是制度的有效性。制度是否能够在经济领域有效反映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关键问题是能否建立起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间的协作机制。三是制度的包容性。制度的包容性体现为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合理化程度。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因素对制度韧性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文化和价值理念是引导和规范个体行为的有效手段,通过教育来传承,向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不断渗透;意识形态是调和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约束;伦理道德是平衡利益冲突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有力支柱,对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综合评价

(一)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是基于经济发展韧性理论内涵确立的 5 个评价维度。结合五个

维度的基本特征和具体构成,进一步设立 14 个分项维度,用以具体化影响经济发展韧性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为了有效规避基础指标选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基础指标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内在一致性原则,要求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够同时反映分项维度的核心要素和方面维度的基本特征;二是代表性原则,由于指标选取不可能穷尽,要紧扣经济发展韧性的内涵和各分项维度的重点内容,选取代表性指标,不遗漏关键性指标;三是有效性原则,避免选取具有代表性但不随时间变化的指标;四是数据可得性原则,要兼顾指标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性,保障原始数据质量和测度结果的准确性。基于此,本文选取了 45 项代表性指标来构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①。具体如表 1 所示。

(二) 数据说明与评价方法选择

本文选取了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2000—2021 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各省区统计年鉴、历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在上述 45 项基础指标中,部分指标数据需要自行测算。其中,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方法参见陆铭等^[14],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测算方法参见干春晖等^[15],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的测算方法参见王小鲁等^[16],泰尔指数的测算方法参见王少平等^[17]。

在进行指标赋权和指数测算之前,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对所有基础指标 5% 至 95% 以外的观测值进行缩尾处理,尽量减轻极端值对评价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二是借鉴王小鲁等^[16]的处理方法,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所有基础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在完成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 2000—2021 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和各分项维度指数进行测度。

(三)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综合评价

1. 时间维度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积势蓄能阶段、2008—2014 年的动态调整阶段以及 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转型阶段。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市场空间不断拓宽,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通过广泛开展技术嫁接以及大量投入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经济规模迅猛扩张,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上升周期。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通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呈现出缓慢提升的总体特征,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制度保障较为有力,但经济体受外部环境扰动的风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相对迟滞。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外部需求急剧收缩,工业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迅速制定并推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保障了社会大局的总体稳定。尽管这一阶段的基础韧性波动起伏较大,但规模韧性持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动能培育加快,制度优势凸显,国民经济的发展成就仍然可观。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投资增速回落,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三期叠加”下的结构性压力给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2014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总体特点是缓中趋稳,经

^①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数字产业成长和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维护经济发展韧性的积极作用,但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并未包含数字经济的相关内容。一是由于数字经济于近年来兴起,2010 年以前相关领域的统计数据大范围缺失,难以准确量化其对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二是本文侧重于强调数字经济发展在未来对于保持和提升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性,因此不将其纳入对过去发展状态的评价过程中。

济发展的结构韧性和创新韧性快速增强,进入了一个挖掘发展潜能、拓展发展空间的转型时期。尽管 2019 年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但由于中国长期发展的经济基

础较为坚实,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内源性优势逐步显现,因而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应对短期不确定性方面仍然保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

表 1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 维度	权重	分项 维度	权重	综合 权重	基础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属性	权重	综合 权重
基础 韧性	0.138 8	资源 禀赋	0.092 9	0.012 9	人均水资源量	反映基础资源的供应能力	正	0.708 4	0.009 1
					人均粮食产量		正	0.291 6	0.003 8
		人口 素质	0.309 0	0.042 9	适龄劳动人口占比	反映人口结构	正	0.386 7	0.016 6
					总抚养比	反映社会供养负担	逆	0.353 2	0.015 2
					人均受教育年限	反映人力资本水平	正	0.260 1	0.011 2
		生态 环境	0.194 3	0.027 0	单位 GDP 废气排放量	反映生态环境风险	逆	0.114 4	0.003 1
					森林覆盖率	反映生态安全屏障	正	0.301 4	0.008 1
					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	反映自然灾害情况	逆	0.126 6	0.003 4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反映环境治理能力	正	0.457 6	0.012 4
		宏观经济 稳定性	0.403 8	0.056 1	经济波动率	反映产出波动	逆	0.252 8	0.014 2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反映价格波动	逆	0.199 0	0.011 2
					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逆	0.219 9	0.012 3
					城镇登记失业率	反映就业波动	逆	0.328 3	0.018 4
规模 韧性	0.092 2	基础设施 规模	0.454 6	0.041 9	铁路线网密度	反映交通基础设施规模	正	0.278 9	0.011 7
					等级公路线网密度		正	0.261 6	0.011 0
					每万人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反映通信能力	正	0.459 5	0.019 3
		市场 成熟度	0.346 9	0.032 0	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反映资本要素市场化程度	正	0.369 0	0.011 8
					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反映劳动要素市场化程度	正	0.351 6	0.011 3
					市场分割指数	反映市场融合程度	逆	0.113 4	0.003 6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反映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正	0.166 0	0.005 3
		经济增长 成果	0.198 5	0.018 3	人均 GDP	反映微观个体的消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正	0.341 3	0.006 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0.310 9	0.005 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0.347 8	0.006 4
结构 韧性	0.271 3	产业 结构	0.655 2	0.177 7	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与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之比	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	正	0.547 4	0.097 3
					工业化率	反映工业化水平	正	0.149 8	0.026 6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逆	0.094 3	0.016 8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正	0.208 6	0.037 1
		需求 结构	0.344 8	0.093 5	增量资本产出率	反映投资效率	逆	0.120 7	0.011 3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反映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	逆	0.095 1	0.008 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反映消费需求潜力	正	0.409 3	0.038 3
					城镇恩格尔系数	反映消费升级情况	逆	0.181 8	0.017 0
					农村恩格尔系数		逆	0.193 2	0.018 1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反映创新经费投入强度	正	0.376 4	0.037 0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正	0.247 2	0.024 3
创新 韧性	0.296 5	创新投入	0.331 5	0.098 3	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反映创新人员投入力度	正	0.376 5	0.037 0
					每万人国内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与申请授权数总和	反映创新成果产出规模	正	0.571 4	0.082 8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重		正	0.428 6	0.062 1
		企业家 精神	0.180 0	0.053 4	就业人员人均专利授权量	反映企业家创新精神	正	0.578 1	0.030 9
					每万人私营企业户数	反映企业家创业精神	正	0.421 9	0.022 5
					财政自给率	反映政府能力	正	0.416 2	0.061 7
制度 韧性	0.201 1	正式 制度	0.736 8	0.148 2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	反映经济制度的有效性	正	0.261 1	0.038 7
					泰尔指数	反映制度的包容性	逆	0.322 7	0.047 8
					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反映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传承	正	0.474 8	0.025 1
		非正式 制度	0.263 2	0.052 9	犯罪率	反映社会秩序的稳定	逆	0.284 2	0.015 0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	正	0.241 0	0.012 7

2. 空间维度分析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分布特征,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见表2)。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空间差异的特征和来源(见表3),本文借鉴周小亮等^[18]的做法,运用泰尔指数法将经济发展韧性指数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其结构分解公式如下:

表2 部分年份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

区域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2021年
全国	27.01	27.45	29.73	33.00	36.40	36.43	41.68	45.98	47.26	50.76	53.83
东部地区	35.09	36.48	40.30	45.25	49.71	50.88	56.77	60.80	61.95	65.34	67.59
中部地区	25.30	24.14	26.42	29.02	32.21	31.65	36.62	41.74	43.59	48.06	53.71
西部地区	20.74	20.85	21.57	23.91	26.64	26.19	31.11	35.99	37.50	40.24	43.54
东北地区	28.53	30.38	33.73	36.42	39.46	38.80	43.80	44.95	44.68	49.67	49.34

表3 部分年份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分项维度指数

分项维度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2021年
基础韧性	42.42	39.75	41.23	40.93	54.97	45.03	56.58	59.76	51.83	52.51	42.24
规模韧性	13.99	16.41	18.99	25.35	28.46	34.31	39.91	45.65	50.03	55.13	58.26
结构韧性	32.99	33.15	34.77	34.87	37.21	38.95	45.44	50.78	54.68	59.30	64.79
创新韧性	7.97	9.77	10.58	16.29	19.28	20.07	25.14	29.29	34.01	39.25	47.44
制度韧性	42.32	42.42	48.13	53.12	51.40	52.20	51.53	54.74	52.38	52.08	54.43

$$T = \frac{1}{n} \sum_{i=1}^n \left(\frac{R_i}{\bar{R}} \times \ln \frac{R_i}{\bar{R}} \right) \quad (1)$$

$$T_p = \frac{1}{n_p} \sum_{i=1}^{n_p} \left(\frac{R_{pi}}{\bar{R}_p} \times \ln \frac{R_{pi}}{\bar{R}_p} \right) \quad (2)$$

$$T = T_w + T_b = \sum_{p=1}^4 \left(\frac{n_p}{n} \times \frac{\bar{R}_p}{\bar{R}} \times T_p \right) + \sum_{p=1}^4 \left(\frac{n_p}{n} \times \frac{\bar{R}_p}{\bar{R}} \times \ln \frac{\bar{R}_p}{\bar{R}} \right) \quad (3)$$

式中, $\bar{R}$ 表示经济发展韧性指数, T 表示全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的泰尔指数,其大小范围为 $[0, 1]$,数值越小,表明总体差异越小,反之则表明总体差异越大。 T_p ($p=1, 2, 3, 4$)分别表示东、中、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韧性指数的泰尔指数, i 表示省份, n 表示全国省份数量, n_p 表示各区域的省份数量, R_{pi} 表示 p 地区 i 省份的经济发展韧性指数。 T_w 和 T_b 分别表示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和地区间差异泰尔指数, T_w/T 和 T_b/T 分别表示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见表4)。

从总体差异来看,2000—2021年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的泰尔指数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总体趋势。经济发展韧性地区差异的变化特征大体上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相契合。在数

表4 2000—2021年经济发展韧性指数的泰尔指数及其结构分解

年份	总体差异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00	0.040 4	0.015 4 (38.07)	0.025 7 (26.65)	0.006 2 (2.78)	0.009 8 (7.24)	0.005 6 (1.41)	0.02 5 (61.93)
2003	0.053 2	0.023 2 (43.55)	0.041 7 (33.63)	0.004 8 (1.54)	0.013 4 (7.39)	0.004 9 (0.99)	0.03 (56.45)
2005	0.056 5	0.02 (35.32)	0.036 2 (27.99)	0.003 3 (1.01)	0.010 9 (5.4)	0.004 7 (0.92)	0.036 6 (64.68)
2007	0.056 4	0.018 2 (32.34)	0.032 8 (25.75)	0.000 6 (0.18)	0.011 6 (5.77)	0.003 4 (0.64)	0.038 1 (67.66)
2009	0.053 0	0.016 6 (31.41)	0.030 6 (25.4)	0.000 5 (0.17)	0.009 5 (5.1)	0.003 8 (0.75)	0.036 4 (68.59)
2011	0.061 8	0.020 3 (32.83)	0.033 4 (24.32)	0.001 (0.28)	0.016 7 (7.52)	0.004 2 (0.71)	0.041 5 (67.17)
2013	0.049 7	0.015 4 (31.08)	0.026 3 (23.27)	0.003 4 (1.15)	0.010 3 (6.01)	0.003 2 (0.65)	0.034 3 (68.92)
2015	0.038 8	0.012 8 (33.03)	0.022 7 (24.98)	0.003 1 (1.4)	0.008 2 (6.38)	0.001 1 (0.26)	0.026 (66.97)
2017	0.036 7	0.012 9 (35.05)	0.021 6 (24.95)	0.005 4 (2.65)	0.007 8 (6.53)	0.003 7 (0.92)	0.023 8 (64.95)
2019	0.031 4	0.01 (31.74)	0.016 2 (21.42)	0.005 4 (3.13)	0.007 3 (7.16)	0.000 1 (0.03)	0.021 4 (68.26)
2021	0.027 2	0.009 6 (35.2)	0.012 3 (18.22)	0.008 3 (5.89)	0.008 8 (10.15)	0.002 9 (0.94)	0.017 7 (64.8)

注:括号内数值代表贡献率,单位为%。

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重视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而相对忽视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协调发展。由于区位条件、政策取向和发展理念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地区之间在发展基础、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中国经济进入动态调整阶段,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探索新的增长路径和发展方式。尤其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中国经济更加重视经济结构优化对于经济效益提升的积极作用,更加注重通过弥合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来释放发展势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韧性差异也随之不断缩小。从结构分解结果来看,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相对稳定,大致分别保持在35%和65%。同时,东部地区对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最高,且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次之且呈现上升趋势,中部和东北地区对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较小。这表明,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区域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但区域内部和省份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长期存在。在新发展阶段,维护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必须对长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的省份和地

区给予更多关注,充分挖掘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潜能,这对于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发展阶段提高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

(一)新人口红利的开发

2010 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发展先后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即将迎来总人口峰值以及随后的负增长,这预示着我国已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应地,劳动力供给短缺、人力资本提升缓慢、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空间缩小等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及其负增长从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已逐步显现,即将迎来的总人口峰值及其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供需两侧冲击将更为突出。尽管在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老龄化并不必然与人力资本改善、劳动参与率提高、生产率改进相伴随^[19]。如果不能及时把握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前的缓冲时间并采取积极措施平衡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不仅会由于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制约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且会给长期经济发展空间的拓展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挖掘带来困难和挑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充分挖掘劳动人口潜力,对冲劳动人口规模缩小的趋势影响,保障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劳动力要素供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至关重要。

(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制造业、能源产业、房地产行业相继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形成强劲增长态势的主导部门,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数量奇迹。随着传统制造业开始饱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和房地产行业风险加大,加之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和外部需求收缩,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给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多重挑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没有经济规模的合理增长来不断夯

实经济长期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必然诱发各类潜在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损害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只有通过培育带动能力强、潜在增长率高和具有巨大市场需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和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才能在夯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转换,为保持和提升经济发展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三)创新驱动能力的形成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来重塑供给侧动力和培育新动能是化解中国经济中长期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从理论上讲,单一强调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必须建立在创新驱动能力有效形成的基础上。尽管在内外环境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进入一个有利于经济转型的创新活跃期,经济社会的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产出显著增加、经济发展的创新韧性持续提升,但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和创新韧性的空间表现不均衡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能力尚未完全形成。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以创新驱动能力的有效形成带动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并促进经济结构的协调与平衡将成为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现实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四)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经济治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影响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共同决定的。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表明,有效的经济治理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中国正处在一个深化经济改革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渡时期。由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经济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的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既妨碍了对生产要素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又掣肘了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世界经济的生产和分工格局正加快重构,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诸多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新发展阶段,保持并提高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效率对于清除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和维护经济发展安全至关重要,而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适应变革能力和稳定发展能力的关键变量。

五、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

(一)以培育和开发人力资本为基础,平衡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并适时开发新的人口红利是新发展阶段平衡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减缓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和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一要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基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系统化推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的深化改革,打造思想教育、理论素养和技术技能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二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就业优先战略,支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坚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推动就业优先目标的制度化。以劳动力市场指标为政策依据,针对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的不同困难,制定灵活的一揽子就业政策措施,加快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积极的就业政策推行上来。三要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缓解劳动力内卷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利影响。立足于劳动力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的特殊性,完善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等制度安排,健全各种劳动法规,破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维护劳动者的各项权益。

(二)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载体,扩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纵深

内部市场发育水平和市场规模是影响规模韧

性的重要因素。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能够拓展资源配置范围、深化劳动分工和挖掘内部比较优势,扩大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能够为经济系统钝化外部冲击带来的被动型震荡预留充足的回旋余地,扩大中国经济的安全空间。一是要持续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为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高效流通提供保障。要着力推动国家现代物流体系和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迅速补齐后发地区的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提升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联通程度。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加快从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向服务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转变,推进数字感知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存算一体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发展阶段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水平。二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流动机制和配置机制。分门别类地制定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地方主体责任,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组织实施,破除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针对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通,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彻底消除直接或间接的地区保护和封锁行为,保障商品和服务的正常流通和有效供给。加大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以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为核心,维护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

重塑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体系的关键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来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转换,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持续稳定增长。一是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要坚持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以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为重点,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来提升传统消费的空间,拓展定制消费、智能消费等新的消费领域,培育消费新业态。同时,注重开发新的消

费产品和引导新的消费热点,充分挖掘老年群体、中高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二是要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要聚焦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投资向相关领域倾斜,形成新的投资热点,确保投资的增量部分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投资。三是要培育新的开放增长点。要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空间。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融资、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带动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开放水平的提升,实现全方位开放发展。加快促进国内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有效衔接,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四是要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要以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流动,打造一批能够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四)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强化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韧性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心任务,对于强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作用,进一步扩大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各种企业、各类产业和各个地区的应用范围,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实体经济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再造。完善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的数智赋能机制,支撑制造业形成柔性制造与智能制造体系,改进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20]。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体系,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机制构建。二是要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新发展阶段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推广节能、低碳、降耗和减污的高新技术,改造和淘汰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的传统

产业,鼓励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显著的新兴产业发展,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产业体系。三是要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拓展产业发展的战略纵深。要坚持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为主体,构建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机制,充分挖掘大国经济的内部比较优势,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产业格局。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东部地区要立足扎实的产业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后来者优势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在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五)以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引领,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因此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而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因此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韧性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核心所在。一是要妥善处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协同关系。加快建立由企业主导、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政府协调配合的政产学研创新平台,健全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创新收益分配机制,以基础研究的深化为应用研究提供知识储备和学理依据,以应用技术的突破带动技术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二是要在科技创新领域突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政府规划创新和市场自主创新的均衡。一方面,以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优化创新环境为手段,充分调动微观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为社会创新意识的增强和企业家精神的萌发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关涉国家安全、重大核心技术和重大发展战略等领域优化顶层设计,整合调配创新资源,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三是要统筹协调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既要强化自主创新以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也应继续发挥模仿创新的后发优势以降低经济发展成本。要聚焦国际科学

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大对重点科研项目和重要研究基地的支持力度,促使更多原创性成果出现,强化先进技术的源头供给。同时,要主动、灵活地借鉴和引入先发国家的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六)以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为保障,促进经济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

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新发展阶段提高经济治理效率的必要举措。一是要以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制度为统领,引导经济发展的激励导向调整。加快建立凸显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的标准体系、多维度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的统计体系、把控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情况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及质量效益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对经济发展路径转换的制度干预,推动经济发展由数量转向质量、由规模转向效率、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以经济增长为主线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主线。二是要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治理的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行为,给市场自主调节和企业理性反应留出充足空间,建设服务型 and 法治型的智慧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完善在重大战略实施、应对突发事件、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安排,确保制度供给尤其是正式制度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有效协同。三是要推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优化和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调整和价值判断转变。要以意识形态建设为核心,构建解放思想的长效机制,引导经济社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共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促进经济发展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刘晓星,张旭,李守伟. 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基于

- 系统性风险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21(1):12-32,204.
- [3] 苏杭. 经济韧性问题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5(8):144-151.
- [4] MARTIN R, SUNLEY P.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1):1-42.
- [5]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 27-43.
- [6] 徐圆,邓胡艳. 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J]. 经济学动态,2020(8):88-104.
- [7] 陈安平. 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J]. 世界经济,2022,45(1):158-181.
- [8] 谭俊涛,赵宏波,刘文新,等.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20,40(2):173-181.
- [9] 杨子晖,陈雨恬,张平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宏观经济冲击、金融风险传导与治理应对[J]. 管理世界,2020,36(5):13-35.
- [10] 王永贵,高佳. 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J]. 经济管理,2020,42(5):5-17.
- [11] 丁守海. 中国经济的短期压力、长期韧性与宏观调控[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6):13-21.
- [12] 孙阳,张落成,姚士谋.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8):151-158.
- [13]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56-269.
- [14] 陆铭,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J]. 经济研究,2009,44(3):42-52.
- [15]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46(5):4-16,31.
- [16]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3-56.
- [17] 王少平,欧阳志刚.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J]. 中国社会科学,2008(2):54-66,205.
- [18] 周小亮,吴武林.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8):3-20.
- [19] 蔡昉. 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J]. 经济研究,2022,57(10):4-9.
- [20] 洪银兴,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23(2):5-16.

(本文责编:辛 城)